

義主族民 義主際國
我土族民 我土際國

行印店書北東

義主族民與義主際國

學大範師平北立國

館書圖

行印店書大常之轄藏大

1 9 4 9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1949. 4. 再版 長. 1—10,000.

目 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一)
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三)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	(一四)
鐵托的民族主義正引向那裏去	(二八)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三五)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四九)
爲徹底克服右傾與民族主義傾向而鬥爭	(七七)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九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為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二) 以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鐵托集團因為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為它採取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佈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

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分子能够堅決地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重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有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分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分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該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共產黨情報局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六月下半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到會各國代表為：保——科斯托夫，捷爾文科夫；羅——波克，德治，盧加；匈——拉科西，傑爾斯；波——培皮曼，薩拉克斯基；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法——杜克洛，法戎；捷——斯朗斯基，西羅基，詹明德，奧萊士；意——托格里亞蒂，謝傑。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問題，並作出了和公佈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本社茲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真理報六月二十九日所載該項決議錄音譯出，並經過初步校正，發表如下：

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之情報局會議，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通過下列決議：

內政外交政策脫離馬列主義路線

(一) 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綫。因此，情報局贊同聯共黨(布)中央之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首先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志的不正確的政策。

對蘇聯及聯共進行非友好政策

(二) 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聯共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允許對蘇聯軍事專家的譴責及對蘇軍不信任的可恥的政策。為對付蘇聯非軍事人員，在南斯拉夫曾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曾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釘梢。駐情報局之聯共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混為一談，並把它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南共中央的反蘇立場，從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共黨(布)脫化、蘇聯脫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中才得到了散佈。

情報局認為：這種反蘇立場，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脫離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

(三) 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似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經濟看成是一個整體。違背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寧的著名論證。列寧說：「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經濟佔着優勢，土地未實行國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制，全國大部份土地還集中在富農手中及採取僱傭勞動等等的條件下，不能以模糊階級鬥爭和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教育黨，這樣，才能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不致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走向民粹主

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認為「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列寧教育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澈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應當成爲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論點。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夠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仍屬於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修改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

(四) 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機關修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內基本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羣衆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爲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綫。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蛻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綫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綫包括着在階級關係上非常複雜的各種分子（工人、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資產階級的政黨。南斯

拉夫領導者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為南共不能有和似乎不應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綫的政綱為滿足。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只是人民陣綫，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黨的使命，在於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複着俄國孟塞維主義者的主張，即馬克思主義黨溶化於非黨羣衆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情報局認為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而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蜕化的危險。

黨內官僚主義與恐怖制度嚴重

(五)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之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為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消滅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組織，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

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殘酷的鎮壓。這種現象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報局認為，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按：尤氏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南斯拉夫民族陣綫第二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民族陣綫總書記）和海德朗兩同志，因為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為在共產黨內決不允准這種可恥的、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南共本身存在和發展的利益，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極端高傲自滿自空一切拒絕承認並改正自己的錯誤

（六）情報局認為：聯共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必要條件，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布爾塞維克式地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對批評兵刃相加的敵視態度，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破壞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態度的學說，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共領導者，在聯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表示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蘇聯尤約維奇及海德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聯共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方面對南共領導者進行了批評之後，南共領導者乃圖宣佈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決議，這一決議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並由於這種匆忙的原因，這一決議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案，這一法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案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後，南共領導者在不久前宣佈自己對蘇聯的愛戴和忠實；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擴大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二十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剷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當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聯共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剷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份。

爲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進行初步的長期的準

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意聯盟，發展能夠組織集體經營農業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澈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那才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府法令來解決此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早已註定了的失敗的冒險，只是自傲和空洞的煽惑人民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想以類似的虛偽和煽惑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要求。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的所有這些法令和宣言，都是煽動民心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污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所以情報局認為這些冒險政策乃是卑鄙的手腕，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左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逃避正當批評拒不出席情報局會議

(七) 估計到南共黨內造成的情況，和為給南共領導者以出路起見，聯共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

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爲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常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的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真正破壞了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裏建立特殊的地位。

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的社會主義陣綫的

道路及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

(八) 估計到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贊同聯共(布)中央對南共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聯共(布)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信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爲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11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行動。

情報局認爲：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

義陣綫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民族主義分子公開取得優勢可能使南國蛻化並

喪失獨立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在於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裏，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曾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又公開地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潛在能力。他們以為沒有全世界共產黨的支援，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住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為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下去。

南共底領導人不了解國際情況及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威脅的技倆，以為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促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顯然是由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綱領出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了解，也可能是假裝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忠實馬列主義的南共黨員應迫使其領導者改正錯誤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綫的充分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夠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按：文中小題是編者所加）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

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 A·沙路班潔

——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專論——

共產黨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裏批駁了目前南共領導之反馬列主義的機會主義路線。這個路線實質上是使南斯拉夫共產黨走向毀滅的路線。

南共領導者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之基礎，這個學說的無敵的力量已在近百年來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中得到了證明。南共領導者一貫的進行着降低黨的作用，使黨溶化在包括極複雜的階級成份的廣大非黨人民陣綫裏的方針。這就損害了黨的基礎，威脅着黨本身的生存，威脅着黨之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威脅着黨之成爲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最高的組織形式及最重要的武器。

南共領導者，首先就是鐵托、卡迭爾、德熱拉斯、蘭克維奇，對黨的問題的取消主義的路綫，使得南共黨處於半合法的狀態。這些領導者們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黨的最兇惡的敵人、間諜、托洛斯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他們企圖建立一個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式的組織形式，並迫使黨實施一種可恥的恐怖制度，在這種情形下黨員的起碼權利都被蠻橫的剝奪了，對不正確領導路綫及領導方法稍加批評就遭受到殘酷的鎮壓。

沾染了貴族式的傲慢、自大習氣的南共領導者們，已走上了脫離社會主義反帝統一戰綫的道路，

離開了南斯拉夫國際主義的傳統，叛變了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並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

被帝國主義的流氓敲詐性的威脅嚇慌了的鐵托、卡迭爾、德熱拉斯、蘭克維奇等，以為向帝國主義作某些讓步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與他們談好南斯拉夫的獨立問題。南共領導者一面用左傾的「革命」旗幟遮掩起他們從民粹主義、孟塞納克、托洛斯基等立場出發的亂驛貨，一面又企圖強迫人民羣衆實行其在帝國主義國家幫助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假牌的冒險主義綱領。實際上這個「綱領」就是脫離社會主義，離開共產主義統一戰綫，和走向資本主義的假面具。「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脫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摘自情報局決議）

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南共領導者修改了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叛變了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之後，就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這種冒險主義的實施就造成了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脫化的實際的危險。

南斯拉夫存在着對黨的取消派的傾向

關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這一學說，是馬列主義最重要的基礎之一。馬克思、恩格斯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政黨就不能掌握無產階級政權，和解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爲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列寧、斯大林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一原理，並創造了適應於新的歷史時代的，適應於帝

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無產階級黨，黨的組織、思想、策略、理論基礎的完整學說。

列寧主義的黨，這一新型政黨的布爾塞維主義之組織原則，乃是在與機會主義者，尤其是在與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進行數十年頑強鬥爭中創立起來的。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不等於整個階級，更不等於全體人民。如果把它們等量齊觀，就是取消了黨和非黨的界限。

馬列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乃是高於勞動人民其它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也就是說，在蘇聯黨應當高於蘇維埃，在南斯拉夫黨應當高於人民陣綫。黨之高於勞動人民一切組織，不僅僅由於黨內集中了勞動人民中的最優秀的分子，而且還由於黨有其特殊的綱領和政策。可以依據這些綱領政策來領導勞動者的一切組織。

南斯拉夫的情況却與馬列主義這一綱領的原理正相違反，他們認為南斯拉夫的基本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綫。

鐵托在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因為人民陣綫不僅是我國各族人民政治上團結的最好形式，而且是我國各族人民在民族關係上友愛和團結的最好形式，所以無論何種政黨也不能代替這個人民陣綫，因此人民陣綫應成爲一個永久的全民政治組織。」

在人民陣綫規章（南斯拉夫人民陣綫基本組織原則）第一項內，就開宗明義的指出：「南斯拉夫人民陣綫是基本的政治力量。」

由此可見，南共領導者認為：無產階級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人民陣綫，而實際上人民陣綫正在逐漸地代替着南斯拉夫共產黨，更確切的說是在篡奪着南斯拉夫共產黨。其本質是使南斯拉夫共

產黨溶化在人民陣綫裏。

南斯拉夫政治領導者（如鐵托、卡德爾等）在他們所公佈的政治性的發言裏，經常提到的僅僅是人民陣綫。

當然，我們並不懷疑，南斯拉夫人民陣綫在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佔領者的解放戰爭過程裏曾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我們也不懷疑目前人民陣綫能是，而且應當是聯合我國一切民主力量的重要手段。

然而，人民陣綫不能夠代替共產黨，而且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實際上，南斯拉夫人民陣綫是怎樣的呢？

大家知道，還在德國進攻南斯拉夫以前，就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發起之下組成了人民陣綫，參加人民陣綫的各個團體，都是來自舊政黨的成份，以及舊政黨中的上層分子。與共產黨併排參加人民陣綫的有：霍爾瓦特共和農民黨，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共和黨，資產階級民主黨和獨立民主黨，塞爾維亞人民農民黨和農業同盟（這兩個黨在戰後已合併為塞爾維亞農業黨）。除了政黨之外，還有很多羣衆性的組織也參加到人民陣綫裏去，例如青年反法西斯同盟，南斯拉夫職工會，和婦女反法西斯陣綫。

可見，人民陣綫所包括的不僅是共產黨，還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不僅是勞動者，還有富農，商人和小工廠主。

德熱拉斯曾公佈說：「參加人民陣綫不受任何思想、宗教、以及其他任何方面的限制。」（引自情報局選集九十三頁）

把這種包括極複雜階級成份的人民陣綫視為我國政治領導的基本力量，這就是直接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而且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部隊。」

黨章裏會清楚的規定了黨的機構和黨的組織原則，沒有這些黨就不可避免地要脫化為散漫的、不定型的、無組織的「機構」，就取消了黨和階級的界限，黨章規定了黨組織的實際工作方法、黨的組織形式、以及黨內生活的規則。

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克思革命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也表現在這樣一件事實上，即是說：如果南斯拉夫人民陣綫有自己的綱領和章程，則南共黨却反而沒有任何綱領、章程。而在這種情形下工作的南共領導者，却沒有感到任何缺憾。並且還熱心地把這種綱領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變成一種美德，甚至，還證明說，共產黨不需要自己的綱領。

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人民陣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鐵托說道：「南斯拉夫共產黨有沒有比人民陣綫綱領更特殊的綱領呢？沒有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沒有另外的綱領，人民陣綫的綱領就是共產黨的綱領。」

南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卡德爾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議上也發表了這樣的關於共產黨和人民陣綫綱領的觀點。南共中央宣傳部長德熱拉斯也重覆着鐵托的意見，認為人民陣綫綱領和黨的綱領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如果，德熱拉斯曾在一九四七年在波舉行的共產黨情報局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說：南斯拉夫共產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堅決依據着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原則進行工作」，那他也就是直接欺騙和當面造謠。實際上，南共領導者已在組織綱領問題上，越來越遠的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已脫變為孟塞維克取消派的立場。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半合法地位

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自己的政黨不僅是爲了取得政權，而且還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保證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

斯大林同志說到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政權在爭取社會主義徹底勝利中的意義時，曾指出：「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壘壘，這就是說——需要加強無產階級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目前南共領導者的機會主義路線使得南共逐漸地破壞自己之被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克維奇等力圖使南共陷於半合法的地位。

在南斯拉夫，諸多有關國家政治經濟、思想生活等問題的重要決議的通過，及向人民公佈，不是用共產黨的名義，而是用人民陣綫的名義。

直到現在黨的組織還保持着半合法的狀態，無論是下級黨的組織、區委、省委以及中央一級黨的組織，都處於半合法的地位。

南共還存在這種情況，即是共產黨員必須掩蓋自己的黨員面目，必須以人民陣綫的某一團體的一

份子出現在羣衆面前，很多黨員說：『共產黨員在工作中沒有權利公開承認自己是黨員，否則就要受到黨的處分。』

在貝爾格萊德的大規模工廠（『日列藥尼克』廠是南斯拉夫有名的五金工廠——譯者註）裏，有四千以上的工人在那裏工作，據黨組織的書記談，廠中有一百六十個共產黨員，這些黨員的黨的會議是祕密召開的，在這些黨的會議上的決議是任何人不許知道的，黨的會議的決議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公佈過。與會的共產黨員只能在某適當的組織內把這些決議通過一遍。但却不能在任何場所引證黨的決議。工廠裏的工人都不知道他們有自己的共產黨的組織，不知道工人中間有共產黨員。關於這件事只有某幾個工人只是在猜疑而已。工廠裏的黨的組織從未用自己的名義在工人面前公開活動。在這種情形下，入黨的手續是：由支部書記祕密地聘請這一工人或那一工人入黨。

南共的區黨委是祕密存在的，他們都採取極端祕密的方式召集會議，從來沒有以任何一種方式向非黨員公佈過區黨委會議的決議。區黨委的工作人員從來也沒有用過區黨委的名義在非黨羣衆面前進行工作。

南共中央委員會也同樣地沒有像一個黨的中央領導機關那樣進行工作，黨的中央全會從不召開，一切黨內生活的原則問題，都在幾個領導者（鐵托、卡德爾、蘭克維奇、德熱拉斯諸人）的狹小範圍裏決定。沒有具體領導，沒有吸收廣大的黨的積極分子去參加解決黨的任務。

從新南斯拉夫成立到現在這個期間內，自上南共中央委員會，下至黨的基層組織，從未公佈過任何一個黨的決議。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機關報『鬥爭報』完全沒有發表過關於黨的生活的文章，奇怪得很，『鬥爭

報」在一九一七年——一八八年這麼長的時間以來，直到現在為止，幾乎完全沒有登載過有關於黨的生活、黨的會議、中央全會、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以及有關於基層黨組織工作的任何一個通訊、論文和消息。在這個期間內任何一個黨的領導者沒有在黨的機關報上發表過有關於黨的生活的文章。在黨報的社論欄裏經常登載的是各種各樣問題的論文，然而却從來連暗示一下共產黨員在解決國家任務中的作用這樣的事都沒有過，從未提出過黨的組織所担负的任務。更從來沒有號召共產黨員成爲執行政府政策中的組織者和先鋒隊。

直到目前爲止，南斯拉夫共產黨實際上是用不合法的秘密方法來進行工作的。南共黨員被迫隱藏起自己的黨員面目，這就是說，每一個爲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戰士的自豪和幸福——共產黨員這個最高尚的稱號都必須隱藏起來。在南斯拉夫民主共和國這樣的稱號是絕對秘密的。

當共產黨已是執政的政黨的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在人民面前，把黨完全秘密起來，這是絕對的錯誤的，是對黨有政治危害的。南共領導者爲了掩蓋自己對黨的問題上的取消派路線，他們製造了許多虛偽的論據，他們說，他們之向人民掩蔽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是爲了去掉南國其他黨派發展力量和進行鬭爭的借口，鐵托、卡德爾想以這種一文不值的狡猾手段來改變歷史發展的規律，來欺騙階級。

然而如果認爲這種一文不值的滑頭辦法可以使階級敵人停止鬭爭這是最可笑的想法。實際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在人民面前隱藏黨的旗幟，僅只是降低了黨的作用，遲鈍了工人階級的武器，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

由於目前南共領導者脫離了國際主義的原則，走向民族主義道路，害怕廣大的黨員羣衆和人民羣衆所產生的合理的憤怒情緒，他們就在黨內形成了可恥的，純粹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

南斯拉夫共產黨內形成了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組織形式，南共中央的大多數黨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舉的，他們取消了共產黨員公開做政治活動，公開向羣衆宣傳黨的觀點的一切可能。在南共黨的生活裏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克維奇等處心積慮地、蠻橫地、剝奪了黨內民主的最起碼的原則。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造成了對南共生存和發展有致命危害的官僚主義制度。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不認爲黨是團結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階級獨立戰鬥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建築在黨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之上的，在這個組織裏每個黨員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而認爲黨是游擊性的隊伍，黨員無權討論黨內任何問題，只應當是俯首貼耳，毫無異議的執行着自己「首長」的一切意圖和指令。南共領導者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和取消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建黨基礎——黨內民主基本原則之後，就在實際上企圖採用軍事官僚主義的辦法，如像已被布爾塞維克主義否定和擊潰了的「官僚家長」，叛徒、托洛斯基想在布爾塞維克黨內使用的辦法一樣。

這種對黨內民主的摧殘，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鎮壓就使得幹部脫離了黨員羣衆，走向官僚主義和束縛黨組織的積極性的道路。黨員都害怕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敢對黨內缺點進行批評，都保持着緘默態度，以免遭受到鎮壓。

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和海德蘭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蘇友好就被開除出黨和遭到逮捕，這種駭人聽聞的事便是南斯拉夫實行恐怖制度的最好例證。

南共領導者在黨內所養成的可恥的恐怖主義的制度，就是他們對自己在內外政策基本問題上所犯的脫離馬列主義的錯誤進行改正中之最大障礙，共產黨情報局指出：「南斯拉夫本身的存在和發展，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南斯拉夫正在奠定着社會主義道路過渡的基礎。在工人階級面前，擺着巨大而繁雜的任務：按社會主義方法改造南斯拉夫經濟，克服南斯拉夫技術經濟上的落後性，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根除資本主義成份，對小私有財產的農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有這些都要求作為南斯拉夫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高度的緊張自己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如果認為不進行階級鬥爭可以解決這些任務，不克服困難和矛盾也可以和平地、一帆風順地、妥妥穩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種想法是極端胡塗的。南斯拉夫領導者還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了本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由此產生的南斯拉夫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日趨尖銳化。

勝利解決這些任務的最先決的條件，就是要加強南共黨的組織生活和思想鍛鍊，使黨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力量和鼓舞力量。

消滅黨內恐怖主義制度，和組織中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習氣，全部公開黨，恢復黨的領導作用，用加強黨的小組會，代表大會，和發揚黨員的積極性，自動性和創造性等辦法來使黨的生活健全起來，發展黨內民主，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南共黨目前生活中的首要任務。

南共領導上脫離了國際主義，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正在進行着從反革命托洛斯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共黨（布）「脫化」，蘇聯「脫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莫西·伯也得及其同類的「理論家」們進行着關於蘇聯脫化，關於只有南斯拉夫是現代真正的革命因素這些愚謬和卑劣的寫作，這不是偶然的。目前，對蘇關係，不僅已成為

考驗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試金石，而且已成為考驗世界上一切誠實人的試金石。現在誰不知道：人民民主國家之能夠獲得獨立，和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只是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由於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創造了蘇聯這個強有力的工農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紅軍擊潰了希特勒帝國主義這架龐怪機器，把歐洲人民從法西斯奴役之下解放出來，和創造了人民民主國家自由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目前南共領導者極力散佈遠論的宣傳，說南斯拉夫是自己從希特勒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蘇聯沒有給與他們任何幫助的話，那僅僅是由於他們的反對蘇聯的企圖在那裏作祟。

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南斯拉夫廣大階層人民羣衆中的威信，是偉大和不可破壞的。南共領導者之所以需要這些對蘇聯的造謠誹謗是因為他們想破壞蘇聯在人民羣衆中的威信，破壞人民羣衆對蘇聯的高度尊敬和愛戴。他們正在左傾的「革命」主義旗幟下煽動民族主義，用以造成南斯拉夫、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間的對立。這就是脫離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道路，叛變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和走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只有在國際主義的口號下，在以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為首的各族人民戰團友誼的口號下，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才能發展。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間的統一戰線，共產主義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內民主運動間的統一戰線，是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的最重要的條件。

南斯拉夫領導者的冒險主義計劃，認為沒有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幫助，沒有別國共產黨的支持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他們可以孤立於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運動之外，這些冒險主義計劃，實際上是脫離社會主義，轉向民主敵人陣營，轉向帝國主義陣營的卑鄙的幌子。

由於南共領導之走向資本主義，他們就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他們把這些對南共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在黨和人民面前隱藏起來，他們徹底的推行着危害黨的方針，想以恐怖主義的制度來窒息其他黨內對南共領導的任何批評和抗議以及南斯拉夫城鄉廣大勞動者階層的批評和抗議。為此，他們就拒絕向情報局作工作報告，拒絕聽取別國黨對南共的批評的意見。他們害怕別國共產黨這種同志的批評，不敢進行公開的討論。他們向自己的黨和人民隱瞞南共黨的實際情狀。

南共領導者，變橫的違反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的學說。染上了極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毛病的南共領導者，對聯共中央及各國共產黨中央的兄弟幫助和友愛批評採取了兵刃相加的敵對態度。

因此共產黨情報局有一切根據在決議中指出：「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為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綫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就毀滅了自己的國際革命的前途，就把自己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就離開了列寧、斯大林關於「勝利國家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成是怎樣了不起的豐功偉績，而應當看成是一種助力，是促進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手段」的這一理論。（斯大林選集五、三九六頁）

顯而易見，南共領導者並不珍惜社會主義營壘的團結一致，不珍重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間的強有力的統一戰綫，也不珍愛別國共產黨的幫助，南共領導者對帝國主義的威脅節節讓步，他們以為用對

帝國主義國家成立某些決議的方法，就可以取得他們的歡心，和鞏固南斯拉夫國家的獨立。他了解，或是假裝不了解這樣的路綫，實際上是向資本主義投降的路綫，無論用怎樣極端「左傾」的辭句來掩飾，都是無法掩飾得了的。不言而喻，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只能使得南國人民失去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南國蛻化成為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明顯地企圖以冒險主義的非常手段形成一種偽裝的面貌，似乎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正是遵守黨內民主制的原則的。這樣他們就匆匆忙忙沒有進行必須的、鄭重其事的和仔細的準備工作就召開了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他們就像發寒熱症似的，草草寫成黨綱、黨章，就公佈了使南斯拉夫在幾天之內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和人剝削人制度的冒險主義法令和宣言。他們之所以用這種非常手段，其目的是想在沒有真正黨內民主和自我批評的條件下來迅雷不及掩耳地召集全黨代表大會，使大會批准目前南共領導上的機會主義路綫。

x

x

x

南共領導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的不正確路綫，這實際地威脅着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生存，造成使南斯拉夫民主共和國有蛻化的危險性。

然而，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很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社會主義統一陣綫的充分健全的力量。

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中指出：「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綫，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就要掉換他們，並推選

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無疑地，南共是有其光榮的鬥爭傳統的。南共黨內一定會有能夠消滅黨內恐怖制度，反抗脫離了馬列主義的南共領導者的力量，一定會有能够在偉大的馬——恩——列——斯旗幟下，在別國共產黨的支持下，領導南斯拉夫勞動羣衆去爲社會主義勝利進行鬥爭的力量。

(葉 琴 認)

鐵托的民族主義正引向那裏去

——九月八日真理報社論——

一九四八年七月通過的共產黨情報局的著名決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形勢」中曾指出：最近幾個月來，那些過去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取得了南共的領導權，而南共的領導機關已脫離了南共的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一切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共產黨都一致擁護情報局這一「關於南共形勢」的決議。全世界的共產黨都認為南斯拉夫領導者，即鐵托集團，正因自己的民族主義政策而被玩弄於帝國主義的手掌之中並削弱了南斯拉夫。

鐵托集團有沒有從這些事實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訓？鐵托集團是否已經懂得，民族主義的政策正使南斯拉夫喪失最真誠的盟友——世界各國共產黨，事實上招致了南共的孤立，招致南共在國內和國外的削弱？

鐵托集團是否已經懂得，他自己將黨和國家已驅置於這樣的嚴重情況中，而由這種情況中脫出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認自己的錯誤，與民族主義決裂並返回共產黨的家庭之中？

沒有，鐵托集團並沒有獲取了有益的教訓，並且也還看不出他已經懂得了這些簡單明白的東西。正相反。對於各兄弟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於鐵托集團錯誤的公正和同志的批

評，他的回答是在其喉舌貝爾格萊德報章上大肆謾罵，煽動對新民主主義各國人民的民族敵視，對於胆敢懷疑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的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施行廣泛的鎮壓，逮捕和暗殺。不久以前，即由鐵托的副手蘭科維奇的手下特務人員殺害了南國解放戰爭中的英雄，在解放戰爭期中曾任南國參謀總長的，前南國高級軍校校長阿爾索尤萬諾維赤同志。他是由於懷疑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政策而被殺害了的。正因此，在南斯拉夫人們才公開議論說：『鐵托集團正蜕化爲政治謀殺者集團。』

顯然，鐵托集團不準備承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更正確的說來，就是他害怕，沒有承認的勇氣；因爲承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是需要勇氣的。更壞的是，他恐懼地統制和鎮壓敢於提起這些錯誤的一切人。

列寧說：『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發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政黨的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

顯而易見，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鐵托集團放到列寧所說的勇敢的，誠實的，愛護自己政黨的那類領導者的範圍裏面去。

鐵托集團的墮落爲民族主義發生在一九四八年春共產黨情報局召開會議之前。鐵托集團的露骨民族主義政策是由這裏開始的，就是他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以與各兄弟黨共同討論南共形勢的問題。儘管情報局不止一次地邀請南共代表團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陳述自己的觀點——正像在以前會議中討

論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問題時所有過的一樣——而鐵托集團却悍然拒絕了參加會議的工作。事情變得很明白了，鐵托集團並不珍視與各國共產黨包括與聯共黨的友誼。這樣就成了與共產黨的國際統一戰綫公開決裂。這樣就成了與國際主義的決裂而走上了民族主義的軌道。

貝爾格萊德的一鬮爭「報辯護說，鐵托和他的同僚都是擁護反帝統一戰綫的。這自然是不正確的，只是用來欺騙「簡單的人」。事實上，鐵托這一集團甚至都不願與南斯拉夫鄰近各國的共產黨相處在一個家庭內，那麼還喋喋於什麼反帝陣營呢？

表明鐵托集團墮落為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基本事實就是這一集團在南共第五次大會中所表現的廉價的，虛偽的，反列寧主義的行爲。許多人曾期望着，大會會在各共產黨友誼的旗幟下，在加強與各新民主主義國家與蘇聯的反帝統一戰綫的旗幟下進行工作。可是在事實上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完全相反的東西。事實上鐵托集團把大會變成了進行反對各鄰國共產黨鬮爭的舞台，進行反對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反帝統一戰綫鬮爭的舞台。這是一個出師反對各新民主主義國家及其共產黨，反對蘇聯及聯共黨的大會。

自然，在南斯拉夫公開談論出師反對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南斯拉夫人民堅定地擁護與蘇聯及各新民主主義國家聯盟。因此鐵托集團就來玩弄一下廉價的技巧，用一些關於熱愛蘇聯，關於對蘇友誼，關於蘇聯在解放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等等的辭句來偽裝自己的反動動員。事情竟至到了這種程度，鐵托的同僚竟建議斯大林參加在這一無恥的動員裏，以便保護民族主義分子的鐵托集團不受聯共和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批評。貝爾格萊德的報紙及其合作者玩弄了一切陰謀詭計，進行最奇怪的最可笑的馬戲班戲子的表演，就是為要向南斯拉夫人民說明：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

而事實上所得的是什麼？鐵托集團玷污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和蘇聯的共產黨，而現在已經和帝國主義站到一個陣營裏去了——使一切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大為高興。代替與共產黨的統一戰綫而獲得了一個與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南共第五次大會擁護並加強了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

政治戲子「鬭爭」報要求共產黨停止揭發鐵托集團的錯誤，要求共產黨對這集團表示信任與支持，否則這種反對鐵托集團的「戰役」會給南斯拉夫帶來嚴重的損失。

不，先生們！共產黨對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既不能表示信任，也不能表示支持。這種情況完全可能給南斯拉夫帶來損失，但在這裏應該責備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與共產黨分裂並向他們宣戰的民族主義者的鐵托集團。

「鬭爭」報的政治戲子們應該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不能並存的，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理论，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他們應該認識到：馬——列主義不能與民族主義或是與共產黨內的民族主義傾向和平相處；爲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爲了民族的自由與友誼，爲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建設，不管民族主義以什麼形式出現，都必須消滅它。

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兩大階級陣營的不可調和的兩個口號，它們表示着兩種政策（甚至可以說是——兩種世界觀）。」

當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以後，在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總想利用民族主義這一有毒的武器來恢復舊制度。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講道：「民族主義傾向是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政策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的妥協，……。民族主義傾向反映出本國資產階級的企圖……資本主義復辟。」

南共的民族主義不僅對整個反帝戰綫給以打擊，而在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首先就打擊了南斯拉夫本身的利益，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利益和南共的利益。

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在對外政策上走向與世界勞動人民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綫進行分裂，走向喪失南斯拉夫最真誠的朋友，自己孤立了南斯拉夫自己。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使南斯拉夫在外部敵人面前解除了武裝。

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在對內政策上走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政治和平，走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團結」在一個「民族陣線」之內，走向由階級鬥爭轉入虛偽的說教，走向南斯拉夫勞動人民戰鬥精神的解除。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使南斯拉夫勞動人民在他們內部敵人面前解除了武裝。

一年前，當鐵托集團還沒有表現民族主義傾向，而和各兄弟黨合作的時候，南斯拉夫依靠着各國共產黨所代表的各鄰近盟國的幫助，感到了自己勇敢而有信心地直向前進。這還是不久以前的形勢。但是，在鐵托集團轉上民族主義的軌道以後，景象就尖銳的改變了。既斷絕了與國際反帝統一戰綫，與新民主主義各國的關係，南斯拉夫就喪失了自己最真實的盟友，並使自己在內部和外部的敵人面前孤立了起來。

這就是鐵托集團民族主義政策的悲慘結局。

鐵托集團不懂得這樣簡單的真理：正是在國際環境中，共產黨的兄弟團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互助與友誼，對蘇友誼與合作——是使新民主主義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戰綫上上升與發展的主要條件，是他們民族自由獨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保障。

「鬥爭」報的政治戲子們進一步武斷地說：對鐵托集團錯誤的批評變成了反對南共的鬥爭，反對

南國人民的鬭爭。

這點自然是不真實的。過去和現在從來也沒有進行過反對南國人民的鬭爭。對於其英雄事蹟已為大家熟知的南國人民進行任何反對他們的鬭爭是有罪的。南斯拉夫人民堅定地與各新民主國家及蘇聯站在一條綫上，這點也是眾所週知的。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對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負責。我們把南斯拉夫人民看作我們真實的盟友。

過去和現在同樣也沒有進行過任何反對南共全體的鬭爭。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南共的大多數堅定地擁護與各國共產黨的友誼，擁護與蘇聯及其共產黨的友誼。在南共的大多數中間有着國際主義的傳統——這點是無疑的。我們也很清楚，南共的大多數並不支持鐵托集團的民族主義政策。我們知道，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受到了鐵托集團及其特務機關的殘酷鎮壓。

進行鬭爭不是為了反對南國人民和南共全體，而是反對民族主義者的鐵托集團。進行鬭爭是爲了幫助南共瞭解鐵托集團的錯誤，並清算南國領導上的民族主義政策。

「鬭爭」報的政治戲子們武斷地說，好像鐵托集團與南共是不可分離的，好像他代表着南共的大多數。

這同樣不是真的。一年以前，鐵托集團可能代表着南共的大多數。但是這是一年以前的事了。現在，當他已經與共產黨決裂以後，當他已經與各鄰近民主國家決裂以後，當他已經移居於民族主義的營幕中以後——現在鐵托集團已經不能代表黨的大數了。鐵托集團現在是一個只有黨內少數信任，而利用其政權機構強制黨內國際主義多數的意志的鐵托宗派。鐵托派既然將黨置於劊子手蘭科維奇的監視之下，既然在黨內實行鎮壓，集捕逮捕和暗殺的殘酷的恐怖制度，他自己就使自己離開了黨。事實

上，鐵托派現在是處於與自己的黨作戰的狀態，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這點。如果鐵托派表現不能用正常的民主方法在黨內維持秩序而必須採取大規模鎮壓的手段——那麼這就是說，他早已喪失南共大多數的信任了。

鐵托派只是南共黨內的少數，他所依靠着的不是黨的信任，而是依靠着南國的行政和警察機構。

（風譯）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脫離了

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勞度作

馬克思、列寧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它已經受了百年以上的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史的考驗，已在俄國取得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並已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列寧思想的無敵的力量已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建設中，在日益高漲的全世界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束縛，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裏得到了證明。

在這爭取人類未來幸福的偉大歷史戰鬥中，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的需要加強一切國家的工人統一戰綫，和團結一切共產黨的力量，以便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是以美國黑斷者為首的，以反對蘇聯、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勞動者為目的的軍事經濟聯盟。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鞏固，全世界勞動者的團結，只有在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一切脫離馬列主義的企圖，對於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嚴重的危險。

正因如此，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裏，指責了南共領導者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個觀點表現在最近期間，他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綫。由於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他們對蘇聯和聯共（布）黨進行着一種非友好的政策；

就使得他們在內政方面：在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的認識上墮落到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階段是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觀點上陷入機會主義的立場；並採取了對南國國民經濟有極壞影響的冒險主義、過左政策。這種反黨、反蘇聯的觀點，就使得南共領導者走上脫離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綫的道路，走上叛變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和轉入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衆所週知，馬列主義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問題——工人階級是一切勞動者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領袖。農民問題——這個工人階級同盟者的問題，應是附帶的從屬的問題。但同時，農民問題對於共產黨仍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問題，列寧曾在一九一九年指出：「一切革命和被壓迫階級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都教導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並領導勞動人民，被剝削人民中的散漫的落後的階層。」（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俄文版十四頁）

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每個共產黨在革命實際活動中的指南。布爾塞維克黨會堅定不移的運用這個原則來領導工作，並會給民粹主義、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和托洛斯基主義這些根本否認工人階級革命領導作用，否定工人階級能夠領導農民的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它的政治活動中是否應當執行馬列主義這一原則呢？毫無疑問的，應當無條件的執行。南共黨員是否能因農民在國民中佔大多數，就可以不把與農民基本羣衆建立聯盟的工人階級

當做主要支柱，而以農民為其主要支柱呢？如果是這樣的方向，就是不了解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直接脫離了最重要的，最有決定意義的馬列主義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列寧說：『我們已和農民結成了聯盟，應了解這個聯盟就是無產階級把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剝削下解放出來，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和影響下解放出來，並把他們吸引到無產階級這邊來，以便共同戰勝剝削者。而孟塞維克認為：農民是大多數，我們——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因此大多數就是有決定作用的。……然而由於農民不能獨立自主，實際上沒有別的路，只有恢復到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一百五十六頁）

在西歐一切國家裏，在人民民主主義的所有國家裏，連南斯拉夫也包括在內，唯一革命到底的力量，能於領導一切勞動者（首先就是一切農民基本羣衆）為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力量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至於包括貧農和中農在內的農民大多數可以參加而且有的已經參加到工農聯盟中去。

一切共產黨，連南斯拉夫共產黨也在內，都必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這絕不等於說只有先進工人才能成為共產黨員；共產黨還吸收着貧農、中農，以及知識分子中的先進的革命成份。然而，一切共產黨，連南共在內，都不應當是農民黨，這就是馬列主義的ABC，是不准許任何共產黨員忘記和忽略的起碼原則。南共的某些著名的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這一馬列主義道路面前，迷失了方向。馬列主義認為在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裏，工人是起領導作用的。南共黨的領導者所發展的則是完全相反的觀點。鐵托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薩卡列普公佈的下列談話裏（該談話公佈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伯爾伯』雜誌），充分肯定的說：『我們向農民說，他們——是我國最堅固的基礎，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得到他們的投票，而是因為，他們在事實上表現是這樣的。』

照鐵托這樣說法，現在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鐵托這話不僅僅否

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且宣佈了一切農民，包括富農在內都已成爲新南斯拉夫的「最堅固的基礎」了。

這還不明顯嗎？這種立場已直接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個立場所產生的觀點，完全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和馬列主義是毫不相容的。

南共中央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是人民民主國家的指導者）的理論，也同時表現在對黨的作用和人民陣綫意義的完全錯誤的估計方面。大家知道，在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與工人、農民、進步知識分子並列的參加在人民陣綫裏。而南共黨的領導者不願意承認人民陣綫中起領導作用的應當是工人階級，這種否認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觀點，就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變爲半公開政黨的狀況。南共中央的領導者輕視職工會，把職工會視爲人民陣綫的附庸組織。應成爲「共產主義學校」（列寧語）的職工會，被降低爲第三等組織，其活動範圍被縮小到僅能召集會議。德熱拉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竟聲稱「召集專門的職工會，專門的人民陣綫會議等等，都是十足錯誤和毫無意義。這些會議應合爲一個會議，因爲職工會是隸屬於人民陣綫內部的。」不久，莫西·伯也得寫道：職工會（即工人階級）在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中沒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們不能算是南斯拉夫國家政權體系中的重要力量。由於南共領導者們在最主要的問題上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他們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也就使他們不願意承認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在解放鬥爭中所曾表現過的，和在新南斯拉夫建設中正在表現着的英雄主義。實際上，這就是對工人階級的叛變行爲。

墮落到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

由於南共中央領導者不承認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國家的領導者，認為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南共領導者們就重演了可憐的、著名的「人民之友」（富農社會主義）的角色，就迷失了馬列主義的方向，而走向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他們忽視了列寧反覆教導我們的話，列寧說：民主主義只有在工人階級裏能找到無條件的，堅決不移的，百折不回的擁護者。誰要是堅定地依靠着這個穩如泰山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他就能夠強大有力。誰要是一面自以為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一面又不以工人階級，却以農民為其主要支柱，他就只能衰弱不堪和孤立無助。農民的民主主義除了自身走向分化以外，永遠都不能產生任何東西。墮落到保衛富農利益上去的俄國民粹主義者的歷史，就是這一道理的最好證例，然而南共領導者們却頑固的依據着這種理論，走上了民粹主義者的道路。

鐵托所發表的觀點，並不是新的，相反的，他是在重彈着很早以前就破壞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修正主義者的老調，這對於一切懂得馬列主義歷史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四年，在其著作「法蘭西和德意志農民問題」一文裏就堅決的批駁了法國社會主義者把保護全體農民的條文混雜到南特斯克綱領中去的企圖，恩格斯指出：「這就是對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直接違反」。在佛朗哥福爾特城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會上，修正主義者福利美爾曾以保衛農民利益（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宣言企圖「收買農民」。恩格斯會斷然的駁斥了這種立場，並聲稱：「與這些思想絕對不能進

行妥協，如果和他們妥協，就是違反我們的基本原則。」

然而，奇怪得很，在恩格斯說這話已超過一世紀的現在，居然還有把農民作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一主要支柱」這樣的共產黨員出現。

托和南共其他領導者們不僅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在農民階級性的問題方面還有着很多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農民是個一致的整體，而沒有看見農民中分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階級差別。南共的領導者甚至連富農這兩個字都不敢提到；當他們不得已說到農民的社會性時，他們就把自己限制在「農村裏有富裕農民」這樣毫無意義的空洞辭句裏。他們抹殺了馬列主義關於農民階級性，農民差別的學說。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史經驗。

共產主義的偉大導師列寧、斯大林曾反覆教導我們說：布爾塞維克黨的豐富經驗，對後起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所作的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中曾說：「從國際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企圖規定的握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待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個階級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深刻基礎的態度，對待小私有財產以及小生產者的態度，已成為進步的綱領。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已擺在我們面前，我想我們定能解決這個任務。我們正在創造着經驗，這個經驗將對後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很大益處，使他們能更巧妙地、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五頁）

這個報告裏同時提到農民特點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關於這點列寧曾說：工人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就應當用一切辦法來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在這些原理中是沒有

任何矛盾的。他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是說明農民是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經濟發展無論就生產工具或就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和工人階級根本不同；工人階級的經濟無論就生產工具或就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公有的社會主義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同時列寧認為「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的，自發的，大量的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俄文版一七三頁）

當然，農民小生產者的這一特點，對於組織工農聯盟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礙。然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的工農聯盟不是工人階級和一切農民的聯盟，而應當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勞動羣衆的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向資產階級成份進行堅決鬥爭，向富農進行鬥爭為前提。斯大林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發展了列寧這一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斯大林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都是機會主義，孟塞維克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做馬克思主義，不可叫做列寧主義。」（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一九二頁）

總之，由於南共領導者在這些問題方面不相信馬列主義，對上述農民問題，就不能瞭解，就把全體農民作為農村的主要支柱，並忘記了向富農階級進行鬥爭。

認為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機會主義觀點

南共領導者忽視了階級鬥爭和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限制的問題；南共領導者在公開談話和文件裏，經常抹殺農村的階級區別，他們沒有動員南斯拉夫黨去克服那些因農村資本主義生長所產生的困難和障礙。

鐵托在其為動員五年計劃而作的談話裏，曾說到了農村經濟部門的任務，但是關於南斯拉夫農村裏的政治困難，關於富農所進行的反對人民政權的殘酷鬥爭，却都一字不提。他沒有號召與會的代表們提高警惕性，沒有向代表們警告：在國內，尤其是在農村裏，階級鬥爭將不可避免的更形劇烈；沒有揭露出富農階級向人民政權進攻的鬥爭形式和方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富農階級所發動的鬥爭就特別明顯的表現在去年進行徵糧工作的時候，這樣的事實很多：富農為企圖破壞徵糧工作計劃，曾故意毀掉他們所有的糧食，殺害了很多黨的和人民政權中的工作人員，富農分子曾打入到人民政權的地方機關裏，進行着各種各樣的罪惡行為，企圖藉此引起勞動農民對政權組織的不滿情緒。

在去年的戰時軍人代表會議上，鐵托曾承認了人民政權組織，在進行徵糧工作時，犯了嚴重的錯誤，指出了很多向貧苦農民和烈士家屬徵收公糧的現象，鐵托聲明將把這些糧食發還給貧苦農民，錯誤將會得到糾正。但是他却沒有分析為什麼會犯這些錯誤，沒有根據南斯拉夫農村階級的鬥爭日趨劇烈的觀點來解剖錯誤的原因。

南共領導者對富農階級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和可能性認識不足，富農階級不可避免，而

瘋狂的反抗南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南共領導者忽視了列寧斯大林關於黨應當使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羣衆提高警覺，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揚他們隨時隨地響應號召的精神準備，以便去進行反對城、鄉資本主義成份和反對反抗我們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的指示。

他們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目前南國條件下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的加劇，似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同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日趨削弱，如像布哈林分子們所鼓吹的資本主義會『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腐朽理論一樣。

某些南斯拉夫的政治工作者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宣傳着反馬克思理論的自流主義。

例如，南斯拉夫對外貿易部部長，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在他的『發展南斯拉夫人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論文（該文公佈於『斯拉夫夫人』雜誌一九四七年五號）中寫道：

『農民經濟對於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和本質的障礙。它是和社會主義部門密切結合在總的經濟計劃之內的，在這個經濟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它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和逐漸前進成爲徹底消滅了經濟法則中的自發現象的部門。』（十九頁）

照他這樣說，那麼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小農經濟和富農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的障礙』，這種農村經濟『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這個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已是再清楚沒有的了。

階級鬥爭的不斷尖銳化，已成爲人民民主國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發展的必然規律，南共領導者忘記了這一真理，並失掉了領導全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能力。

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南共領導者在政策上沒有堅定的原則上的依照馬克思主義方式來制定政治路線，他們經常從一個方向搖擺到另一方向去，時而右傾，時而「左」傾。在聯共（布）中央批評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成份發展估計過低和在本國宣傳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理論的錯誤之後，南共領導者就迅速的採取了對策，以便證明這種批評是「不公正」的。爲了證明在南斯拉夫已充分的消滅了反動派的基礎，他們就通過了包括小工商業國有化在內的，補充國有化法令。這種法令由於毫無準備工作和匆忙進行的原因，只能使南國人民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的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令，這種法令也是毫無準備的，因此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近，南斯拉夫領導者更充分自信地頒佈了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

情報局在決議裏公正的指出，南共領導者之在南國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只能是冒險的行爲，因爲當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還存在時，當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的時候，是絕對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南共領導者的這種冒險政策是由於他們否認了馬列主義關於消滅階級鬥爭必經過程的理論，和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產生的。聯共（布）黨的經驗證明：只有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和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構成部份，一切以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這一任務的企圖，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冒險性，都不能免於預先註定了的失敗命運。

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曾進行了怎樣深刻的革命改革，資產階級及地主都被肅清，一切土地、工廠、銀行、交通運輸等都進行了國有化，在殘酷的貧、富農間的階級鬥爭中，富農的基礎被強有力的摧毀了，大部份貧農都得到了巨大的勝利果實，都被提高到中農的水準，整個鄉村都中農化了。然而聯共（布）黨任何時候都沒有依據這些事實做出農村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結論或是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可以消滅全國資本主義殘餘的結論。列寧指出：『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經濟國家裏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着比共產主義還堅固的基礎。』

同樣，大家也知道，在十月革命後十五年的過程裏，都是這樣，首先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然後才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十五年中這兩個步驟，一直沒有離開過布爾塞維克黨的議程。

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布）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說：『黨在新經濟政策進行的整個時期內，堅決的執行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發展的政策——其辦法是：進行農業累進稅制，限制地租，擴展農村經濟中僱傭勞動的利益，用僱用借貸來扶助困難的經濟單位，以及執行一切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包括強力扶植國家工業等在內）。然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鄉村和城市一樣澈底克服和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簡單來說，這不是別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

列寧、斯大林黨實行了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之後，黨就把貧農和中農團結到自己周圍，就孤立了富農，也就為基本農民羣衆根本轉入集體化道路準備了必要的前提。

當這些前提都已形成之後，黨就把限制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轉變為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已取得了集體農莊制全世界歷史性的空前勝利。

對聯共（布）黨，這種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基本條件的經驗估計過低，就在南斯拉夫產生了重大的

政治危險，犯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許可犯的錯誤。因為，單在城市和工業方面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須在農村裏，在農業經濟方面，同時進行。

南共領導者最近期間執行的「左」傾政策已經超過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的任務。這些冒險主義的政策是不能適應目前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的，這些辦法只有進一步的使工農聯盟發生混亂。

對合作社制度的右傾機會主義了解

任何人都不想降低南斯拉夫土地改革的意義，然而我們如果過高的評價了這個土地改革的效果也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關於土地改革的效果，卡德爾曾於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上宣佈說：「土地改革更加使人民政權與勞動羣衆接近，並使鄉村富有的投機分子陷於孤立，這樣，當然就根本給鄉村中全部資本主義成份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土地改革大大減弱了他們對小農生產者的壓力，並用一定的界限，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可是，南斯拉夫農村的實際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一點能令人心滿意足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素稱農業國（務農人民佔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南斯拉夫農業經濟，目前仍然是一片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

南斯拉夫的土地沒有實行國有化，仍然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南共領導者認為實行土地國有在南斯拉夫是不適合的。企圖在土地私有財產制的原則下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南斯拉夫有將近二百萬佔地不過五海克脫的農民。與這些農民同時存在的是大規模的富農經濟，因為依據一九四六年推行的土地改

革法令，最多土地的佔有者，可以佔有十五——三十五海克脫可耕地。由此可見目前南斯拉夫農村經濟中存在著富農經濟發展的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些富農經濟，就是反動派在農村裏的基礎。

南共領導者們，經常以工業國有化，發展農村合作社，『給我國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力量以致命打擊』（卡德爾語）等話來安慰自己。由於南共領導者曲解了列寧、斯大林合作社計劃的原則，他們就過高的評價了南斯拉夫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這種過高評價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很大的害處。

南斯拉夫的農業合作社，在組織方面還很脆弱，還不能很好的進行工作，還只限於交換的範圍，還不能進行任何較大的生產；還不能改變小商品生產的基礎。而這個小商品生產正是資本主義成份的最深刻的基礎，卡德爾否認了消費和日用品供給合作社不能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致命打擊』這一個眾所週知的事實。

而且，即令，這種消費、日用品合作社能夠廣泛的供給個體農民經濟，資本主義成份在生產範圍方面仍能發展起來。由於富農在大生產方面佔著優勢，他就排擠著小農和最小的農民經濟，使他們在競爭中毫無出路。

我們應當再次記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社會主義部門，佔全國貿易方面比重的百分之八十一·九，合作社和國家經營的部門已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然而，這還不能說富農經濟已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聯共（布）黨堅決的警告著資本主義成份迅速發展的危險性，在一九二七年底，聯共（布）黨第十五次大會上莫洛托夫同志說：『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就在於目前富農仍佔有超越於集體經濟的優勢，因此富農經濟還在打擊著力量微弱而和中等的經濟。』

我們的農村經濟中的基本矛盾就在於此。我們無論如何，應為貧農和中農找一條出路。」

列寧、斯大林黨在農業經濟的集體化方面，在小農經濟生產合作社方面為貧農和中農找到了出路。南共領導者過高的估計了消費、日用品供給合作社的意義，並把它與生產合作社對立起來，他們這種態度是和馬列主義毫不相容的。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認為普通形式的合作社，乃是集體化的前提之一。只有集體化的農業經濟，在粉碎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工作中才有決定意義。

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就是建設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重工業，以使用技術來供給農業經濟。把農民羣衆的最普通的合作社形式，從交換合作社的範圍，提高為生產合作社，也就是走向集體農莊的道路，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給富農以致命打擊」和建設社會主義。

由上述問題裏可以看出，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對於南共黨，南斯拉夫人民有着嚴重的危險。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使得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有化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危險。

（葉羣譯自七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綱領出發，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蜕化為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為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為什麼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為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鬭爭是與階級的鬭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鬭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解「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為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Nationalism，或譯為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即資產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狹隘利益出發的。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有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有幾個不同的集團。而為着追求自己的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使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惜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但因為它的利潤貪慾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國外佔有市場，原料出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為本國資產階級服役，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

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切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要使整個人民的利益服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民族』這個名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為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為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份以收買國內一部份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對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夠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為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

的統治者變成更小更小的數目，這類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為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世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為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去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愈多，他們的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緊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與對外的侵略，甚至要完全武斷的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種」，因而就有權統治世界的其他部份，有權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由於幾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着掠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了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一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勢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一定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是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的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為犧牲，來達到它保護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梯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較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波蘭的比爾蘇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更不惜跪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拿出「民族主義」這個口號

去煽動人民，而在對這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爲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即民族觀，也就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爲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和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

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徹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在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線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份，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族解放而鬥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鄙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羣衆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倚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

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道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壓迫民族中，即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地、無條件地反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舊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地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深深了解馬克思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去消滅、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為裝飾的空談，

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原則，英勇地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綫，爲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奴役下的歐洲各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安南，英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樣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

另一方面，則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歇爾計劃。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

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羣衆，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羣衆——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對的口號，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誠心去幫助其他民族爭求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

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幫助菲律賓獨立』，英國幫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它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是不能希望任何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忠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常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誣蔑。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取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

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三 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的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的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爲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後，還有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裏，在這些國度裏，不消說只有上層分子，只有資本家，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零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

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分子、資本家」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況，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鬥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綫，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暴，更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朽腐、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的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繼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綫，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為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鬥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各民族的更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是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朽腐最反動

的獨佔資本的產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民族圖畫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的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其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賣國賊鬥爭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

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新生，表現着世界人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

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的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即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的規模，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繼續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去絞殺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十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又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佔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妄想：有一天在蘇

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狀況。

四 目前世界的兩大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訂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置於自己的控制和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量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色人種優越的「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並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此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共產黨情報局，並在國內實行摧殘真正進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的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够執行與贊助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援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要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爲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走狗，在美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民主力量。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爲更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正在大大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正在日益廣大加入反對它們的鬥爭，最後推翻它們的統治的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

國賊，即全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贏得社會主義，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與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上，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為自己的解放而實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地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為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鬥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這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

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要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鬥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這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你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鬥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力量，如果能够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的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澈底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且要澈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澈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

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夠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去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的勝利。

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終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的國際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

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要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

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即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重奪南解脫作爲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要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己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

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情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警覺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切地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真正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整個革命問題聯繫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看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依據新的世界歷史全局，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而不應該再從這個新時代以前的舊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份，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新民主主義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這本書中所詳盡的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

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破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想，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鬥爭從階級的鬥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鬥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鬥爭的道路，到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鬥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像在蘇聯那裏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的階級剝削制度，社會生產力在那裏有無限發展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別人，所以它就成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

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之後，那時「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爲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 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

性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爲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曾經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制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爲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羣衆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

列寧所說：「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常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列寧）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為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在後一個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是轉向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

被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有很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革命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反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聯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擁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裏面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轉到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蔣汪兩賊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部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份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對於尚在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羣衆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應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與階級

問題相聯繫，民族的鬭爭是與階級的鬭爭相聯繫的科學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民族在某種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爲什麼這樣的民族不但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份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地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裏的資產階級也是只按照他自己的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並根據他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利益完全一致。當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鬭爭舞台上，成爲全民族反帝鬭爭的首領，成爲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聯蘇及擁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蔣介石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爲帝國主義的奴才，成爲萬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鬭爭的存在，當國際與國內的歷史鬭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與南斯拉夫的鐵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 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即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爲「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分隔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厚的感情之一。」「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煽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家長制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不長進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分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欺騙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爲澈底克服右傾與民族主義傾向而鬥爭

——波蘭工人黨總書記貝魯特關於波蘭工人

黨中央委員會九月全會的總結報告摘要——

對我黨有害而危險的，存在於我黨領導方面的危機狀態已繼續三個月了。我黨政治局曾致力於克服這一危機，以便挽回我黨領導機關在組織上的團結與思想上的統一。黨中央七月全會，曾對我黨領導機關危機的思想根源給予了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估計。在當時，中央全會的參加者們便已清楚知道，我黨底部份領導者，在國際工人運動的根本問題上，在對於工人運動歷史傳統之估價上，及從這一估價出發，在確定我黨今後領導路線，及與統一各工人政黨這一主要問題相關聯的我黨底當前迫切任務上，存在着嚴重的思想動搖。

黨中央的七月全會，總書記哥穆爾卡同志根本沒有參加，但他底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正就是造成我黨領導方面危機的原因。由於哥穆爾卡同志的缺席，曾使得黨中央七月全會無法研究危機的各種因素，甚至無法指出這一危機的嚴重程度，無法通過各種必要的政治決議與組織決議，以便在危機的初步階段即將其迅速撲滅。然而不僅全會的參加者，而且黨的全部積極分子，並經由積極分子而使全黨都了解了黨中央七月全會關於思想問題的指示之重要意義。

七月全會的指示使我黨積極活動起來，幫助提高了黨的工作水平。可是哥穆爾卡同志及部份由於

持有錯誤觀點與對哥穆爾卡同志抱有某種程度上的個人同情，因而妨礙了自己了解七月會議工作的思想意義，了解必須使黨成爲在思想上更有戰鬥力的黨，以便同動搖，同錯誤觀點，同企圖鑽進我黨的敵對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作鬥爭的同志們，沒有立刻了解黨七月全會的決議與指示，這也是事實。

唯其如此，所以在最近一次黨中央全會的議事日程上，遂將同我黨領導機關中右的民族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問題，將分析這一傾向的思想根源及克服這一傾向的方法問題列爲會議底主要議題。

在革命政黨中那些未被及時克服的，隱瞞着黨或公開進行頑抗的思想動搖與思想錯誤，總是不可避免地要發展成爲脫離黨的基本路線，發展成對黨與工人階級的嚴重危險，被階級敵人利用，使之變爲反黨的工具，以削弱黨的力量；如此舉得遲，則進而使黨離開其原來所走之道路，這是常有的事。因此，我黨政治局及最近一次中央全會認爲，必須將我黨領導機關內存在右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問題，毫無遺漏地全盤地向黨提出，以使用全黨的共同努力完全、澈底克服這一傾向。

早在一年以前，九國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成立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的時候，哥穆爾卡同志，由於對當時國際形勢估計不足，即曾表示出動搖。僅僅在同志們與政治局的壓力下，他才放棄了自己的立場，但仍抱着懷疑與保留的態度。政治局在黨中央全會上，於自我批評地評判自己對於當時這一思想動搖所採取之態度時，指出它當時沒有採取足夠明確與堅定的立場對待這一思想動搖，指出這些分歧在當時是被掩蓋起來了，而沒有予以澈底克服。

因此，當南共黨內產生了把黨推向錯誤道路的嚴重危機時，哥穆爾卡同志的思想動搖便更明顯地暴露了出來。

毫無疑問，南斯拉夫事變的發展，曾是促使哥穆爾卡同志在我黨六月全會上發表演說的原因。

列寧對於波蘭工人運動的評價

我國工人運動底歷史，乃是在與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底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直接聯繫下發展起來的，而哥穆爾卡同志在報告中對於我國工人運動所作之非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的評價，對於我黨整個領導機關說來，正像晴天霹靂一樣的突如其來。列寧會以其特有的深刻的洞察力注視波蘭革命運動的發展，曾自我國革命運動的經驗中——成績與錯誤中——取得不少的結論與教訓，這些結論與教訓都曾經過詳細的審查而總結在他的理論著作中。他對於波蘭工人運動中的各個派別均給予了批判性的評價，這些評價無論就其深刻性與就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來說，都是無與倫比的；他指出了盧森堡宗派主義理論的思想根源，而這種理論乃是曲解當時馬克思主義的（雖然還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波蘭社會民主黨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之活動的；他無情地揭露了當時波蘭社會黨右翼沙文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真面目，指出當時波蘭社會黨右翼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可以說，在列寧的政治論文與理論著作中，對任何一個革命運動的隊伍都沒有像對波蘭革命運動這樣，作過如此詳細，如此全面的研究與分析。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列寧對於我國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們很熟悉，他在代表大會與黨的國際代表會議上曾與他們不止一次地會過面，聽到過他們的發言，在十數年間注視着他們的言行。所以直到現在，除了列寧著作中對我國工人運動及其傳統所

作之評價外，便再也找不到有較此更為深刻，更為合乎歷史唯物論方法的評價了。

毫無疑問，哥穆爾卡同志在六月全會上的報告，乃是有意識地修正列寧對我國工人運動史的評價，其修正方法，就是把民族解放鬥爭與階級鬥爭完全分開。哥穆爾卡同志對於政治局全體委員所提出的論證，不去作認真的討論，而僅以聲明辭去黨的總書記一職來回答。僅僅在經過尖銳的批評以後，哥穆爾卡同志才在黨中央最近一次全會上作了內容較為廣泛的發言，中央全會認為這一發言，乃是哥穆爾卡同志對其迄今所採取的根本錯誤立場試圖進行重新審查的一種表現。

在哥穆爾卡同志的許多評論中，對於波蘭工人運動歷史的全部評價都是片面的不正確的。對於波蘭獨立這一根本問題，他說這是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沒有聯繫的。然而波蘭工人革命運動，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已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的；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並爭取政權，而在這些鬥爭中，不僅遇到了資產階級底兇惡抵抗，而且也遇到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活動的代理人——主要是波蘭社會黨右翼底尤為瘋狂的抵抗。波蘭社會黨所提出的獨立口號，對於波蘭社會黨中與畢爾蘇斯基分子有密切聯繫的右翼領導者說來，和對於參加該黨的工人與該黨左派說來完全是兩回事。在右翼領導者們看來，這一口號乃是分裂工人運動，反對進行工人運動的革命階級達到其目的，而保護資產階級政治利益的重要武器。

對於資產階級說來，取得自己的國家，那怕這個國家是殘缺不全，是依附於曾經參加瓜分波蘭之各國的，從鞏固地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權的觀點看來，也是有意義的。波蘭社會黨右翼根據資產階級底這些基本目的，遂力圖將革命運動的發展僅僅限制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階段——即限制在為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建立基礎的階段，在這一範圍內，工人階級可以較為廣泛的提出自己的政治、經濟口號，而

主要是在議會鬥爭策略範圍以內。在波蘭工人運動中，兩個原則上對立的派別所提出的目的與任務，就是有着如此的原則區別的。

但哥穆爾卡同志却將波蘭社會黨這一非列寧主義的爭取獨立的觀點「作為兩黨合併之思想基礎」。

由於哥穆爾卡同志在關於國家獨立問題的意見中，缺乏革命的與階級的立場，及其對於自己錯誤思想的固執，遂使他抹煞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勝利對於波蘭獨立的決定意義。哥穆爾卡同志對於政治局決議草案的答覆是：「我不同意這種關於波蘭社會黨底獨立觀點業已破產的說法，因為這裏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究竟誰的觀點勝利了。」關於這一問題哥穆爾卡同志的回答如下：

「波蘭社會黨底獨立觀點，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並沒有破產，而是在一九一八年就勝利了。這完全不能因為波蘭獲得獨立是由於俄國革命及歐洲革命運動的結果這一事實，而有所變更。」

像這種煩瑣哲學式的說法，在哥穆爾卡同志當時的許多言論中是汗牛充棟的，這證明他已陷入非常危險的公然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境地。

為爭取人民的波蘭而鬥爭的波蘭工人黨

顯而易見，在希特勒準備進攻歐洲，在這種進攻正在威脅着波蘭的時期，波蘭共產黨應當提出保衛波蘭獨立的口號，而且它正是這樣作了。在這樣的時期，階級鬥爭問題本身也要發生原則的變化。就是要建立全民陣線，以便與企圖迫使各弱小民族服從於自己意志的帝國主義強盜作鬥爭。當此戰爭

已經變成反對當時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強盜的，正義的民族戰爭時，波蘭工人黨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正是採取了這樣的立場。

波蘭工人黨一方面站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列，一方面即將爭取波蘭解放的鬥爭與爭取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勞動人民大眾的政權鬥爭聯繫起來。作為人民代表機關的邊區人民會議之建立，就是這種鬥爭的表現。

在為建立邊區人民會議及地方人民會議形式的政權而鬥爭的時期，我們會特別成功地使波蘭內部城鄉勞動大眾的力量與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成長為武裝力量的蘇維埃國家底革命力量進行合作。正是由於這種國際革命力量的合作，在波蘭以及其他國家，稱為人民民主的特殊政權形式才得以建立起來。毫無疑問，這種力量是帶有階級性的，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權是帶有階級性的，因為這種政權是以領導廣大勞動人民（首先是貧農與中農）陣綏的工人階級為盟主的。在建立邊區人民會議時期，我黨內部某些同志對於階級力量的實際對比，特別是對於這些力量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與蘇聯武裝力量合作的意義是估計不足的。我們不能把蘇聯的武裝力量僅僅看作是軍事同盟國的力量，而應看作是革命的解放的力量，是階級盟友的力量。

對於階級力量對比沒有足夠的估計，就會造成思想動搖，正如黨中央全會決議第五項中所指出者，這種動搖即表現在企圖曲解邊區人民會議的涵義上。

這一思想動搖的特點，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我黨中央機關報「自由論壇」上，經哥穆爾卡同志的同意而發表的濱考夫斯基所著「我們的立場」一文中，最清楚地表現了出來。

在這篇說明黨於波蘭解放前夕，關於政權這一基本問題的立場的文章中，完全沒有邊區人民會議

的概念。在波蘭解放前夕，在爭取政權鬭爭的決定關頭，我們可以看到該文作者顯然把希望寄托於充作反動陣營政治支柱的各種政治集團——以米柯拉茨科為首的農民黨右翼與農民黨中央委員會。（它是以破壞邊區人民會議為目的而召開的倫敦代表會議的副產物。）所有這一切，只能是機會主義的放棄爭取以工人階級為盟主的勞動人民大眾政權的鬭爭口號，只能是在決定關頭，企圖離開人民軍隊的核心與領導者，邊區人民會議底領導者——我黨所組織與領導的鬭爭前綫，而絕不能是其他。

當着勞動人民大眾依靠以工人階級為首的國家政權，準備建立新的革命法律時，該文作者却在說服反動派相信憲法形式之必要；而這種形式只會保證米柯拉茨科的統治的。在當時，我黨機會主義者們所看到的出路是什麼呢？讓我們來讀一段話：

「必須施以壓力，使那些不受人民支持，執行違反波蘭基本利益政策的人，離開其非法獲得的最高職位（如總統，軍事統帥）；就是說，必須根據波蘭民主底要求改造政府……。」

總而言之，就是以撤換總統與統帥的辦法來改造反動的倫敦流亡政府，以便保持米柯拉茨科，克瓦賓斯基及其他死心踏地忠實於農民黨反動領袖的份子們底陣地，這就是我黨右翼集團在為國家政權而鬭爭的時期所提出的整個機會主義綱領，而這一個綱領是沒有遭到哥穆爾卡同志的反對的。

我應當聲明，這一個所謂「我們的立場」並不是我黨的立場，而是我黨右翼集團的立場。因為在這時期，黨在全國建立了地方人民會議，組成了新的人民軍隊，以羣衆鬭爭與進行下層組織工作的方法，而不是以聯合「上層」的方法鞏固了工農聯盟的勝利。我黨充滿信心與信念地準備了爭取國家政權的鬭爭。下層組織中沒有一個人對於勝利是懷疑的。那末，為什麼我黨當時的領導機關中受到哥穆爾卡同志庇護的機會主義集團竟找到了另外的道路呢？我想可以簡單地指出兩個基本的原因：

第一，這是由於對工人階級底力量估計不足，對於在我黨領導下同佔領區進行鬭爭的戰火中生長並鞏固起來的工農聯盟的力量估計不足的結果。

第二，這是由於不了解蘇聯底社會解放實質的結果；他們不了解這種社會解放意圖乃是根據聯共（布）黨的思想原則，根據聯共（布）黨在各國民主力量底國際反帝國主義鬭爭中的作用而產生的。我們認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沒有澈底了解，不了解它一貫是聯共（布）黨的指導原則，不了解正是這些原則決定聯共（布）黨今日要在反帝國的國際鬭爭戰線中起先鋒作用，這也是哥穆爾卡同志思想動搖的根源之一，因此我黨才給予他以公開的批評，其目的，在於幫助哥穆爾卡同志及一切對上述各點未清楚了解的同志，克服他們因對上述各點不了解而產生的思想動搖。

在進行此種批判性的分析時，同樣不能忽略其他某些，如中央全會決議中所已指出的，逐漸成長起來，致使哥穆爾卡同志走向脫離我黨基本路線的右的民族主義傾向的錯誤立場。使得哥穆爾卡同志發生思想動搖，抗拒情報局決議中關於說明各馬克思主義政黨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使貧農、中農擺脫投機分子與資本主義成分剝削的思想綱領，這一部份之原因何在呢？

促使他採取此種立場的原因，乃是無可懷疑的機會主義傾向，即逃避同鄉村資本主義成分進行鬭爭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如果不進行此種鬭爭，就不可能進一步勝利地向社會主義邁進。

這種機會主義傾向，在哥穆爾卡同志最近一個時期所發表的，關於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黨合併問題，關於兩個工人政黨合併之方法問題的言論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貫穿所有這些言論的錯誤思想，就是認為實行兩黨合併，可以不排除波蘭社會黨部份老幹部中與不久以前的B·P·H有聯繫的，在思想上與之相勾結的右翼分子，可以不同敵對的思想影響進行尖銳的鬭爭。

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乃是未被澈底克服，而又死灰復燃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再現，對於這種思想，我黨過去曾經進行過，而且將來也還必須繼續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

哥穆爾卡同志錯誤的根源

我們已經說過，哥穆爾卡同志底錯誤，正如中央全會決議中所指出者，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而是一系列的右傾民族主義性質的觀點表現，雖然這些錯誤本身有着內在的矛盾。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追問，這些錯誤的根源何在？這些錯誤是怎樣生長起來的？爲什麼它們恰巧在最近幾個月內全部暴露了出來？

在哥穆爾卡同志的思想中，最危險的東西就是不可克服的民族狹隘性與地方觀念，這些東西縮小了他的政治視野，使他看不見在目前時期民族要求與國際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繫，結果遂使他得出了錯誤的，在實際上非常有害的政治結論。

因此，在他對波蘭工人運動的估計中，便產生了一種把爭取獨立的鬥爭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分開的傾向，因此，便產生了他對人民民主本質及其變化之不正確了解，而跌落到什麼介乎自由資產階級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間的特殊「中庸」的立場。

因此，正如決議中所說，便產生了隱匿下述事實的傾向，此即波蘭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然有其自己的某些特點，但它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般發展道路之一種，而絕非其他。它之所以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般發展道路之一種，乃是因爲社會主義在蘇聯已先獲得勝利，而我們的道路，則是依據於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並考慮到波蘭所處新歷史時期的各種可能性及其歷史發展之特殊條件的。

因此，便產生了他對於聯繫人民民主國家與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關係之實質的不了解，他了解它們之間利益的一致性。他不了解人民民主國家與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是和人民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有着根本區別的。

因此也就不了解，為保衛國家主權免受美帝國主義及其德國代理人之擴張威脅而鬥爭的實質。

這些錯誤的產生，是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抱有根本錯誤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是因為他在農民問題上抱有根本錯誤的機會主義立場。這些錯誤與發生於南斯拉夫的，因未遭到反擊以致完全蛻化了的同類現象有着如此驚人的相似。

這些現象之相似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是自同一的根源中生長出來的。

這些錯誤為什麼在最近才表現出來了呢？其原因何在呢？

當我黨將全部鬥爭集中於反對經常公開要求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的反動的法西斯力量時，在哥穆爾卡同志的觀點系統中，並沒有暴露出他潛藏的機會主義思想。在那一時期，毫無疑問，哥穆爾卡同志對黨是建樹過不少功績的。但當反動的法西斯的基本力量已被擊潰，波蘭人民民主已進入其發展的一次一階段時，當資本主義投機分子利用我國戰後困難與鄉村的貧困，而漸趨鞏固與增強起來時，一個新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的力量——徹底的民主力量，亦即工人與勞動農民的力量，這是一方面，與另一方面城鄉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矛盾便開始出現。這時，在議事日程上便提出了與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鄉村的資本主義分子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問題。於是在哥穆爾卡同志的戰團立場上，便開始出

現了裂縫。暴露出他思想上的軟弱性。毫無疑問，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南斯拉夫事件就是最清楚的明證），如決議中所說，存於人民民主制度中的資本主義力量與反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矛盾便日益明顯地上昇到了第一位。

資本主義勢力總企圖「鞏固」現存的階級力量對比，以等待更有利於自己的時機，總希望在人民民主制度條件下，穩固地保有它恐怕是現有的一點使資本主義成分存在的可能性，指望資本主義成分不能堅持下去，指望從小商品經濟中再生長出一些資本主義力量，最後，指望從外面得到盡可能的援助。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則力圖以排擠與消滅資本主義成分的方法，使社會主義成分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至於貧農與中農呢，他們則希望擺脫富農的剝削，擺脫鄉村土豪對他們的重壓，希望促進工農聯盟的更加鞏固。

在這種情況下，我黨右翼集團過去潛伏着的機會主義思想，那種和緩階級鬥爭，為富農，為其實行經濟擴張，從而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其實行政治擴張的天然要求創造便利條件的傾向，遂暴露出來。

正如工人運動多年經驗所告訴我們的，機會主義通常是與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社會民族主義——攜手並進的。在我國的情形恰巧就是如此。在我國，機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瓜葛關係，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因為它利用了我國未經耕耘的民族主義成見的肥沃土壤，利用了被階級敵人竭力煽動的反對俄羅斯人的與反蘇的情緒。

由於全世界帝國主義陣營與反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力量的消長，目前較任何時候都更形劇烈，所以

對蘇聯的關係已成爲檢驗對國際主義忠實與否，對社會主義事業忠實與否的試金石，同時也是保證我國獨立主權的唯一堅固的支柱。

無論是什麼主義也罷，民族主義也罷，都是與資產階級妥協或與資產階級靠攏的同一階級內容之各種不同表現形態。

一九一五年，列寧在其與臭名昭彰的孟塞維克波特列索夫的論戰中曾寫道：

「機會主義與社會民族主義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共通性與血緣關係，這是毫無疑問的。……」

「……社會民族主義從機會主義的地基上生長起來，而且正是後者給予了它以力量。……」

「其中或許個別人還老老實實地認爲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但是評判一個人，並不是根據他怎樣想的，而是要根據他的政治行爲，但是這些所謂「國際主義者」們，因爲他們並不是機會主義底堅決澈底的敵人，所以他們的政治行爲一貫是幫助或支持民族主義派的。」

在這幾句話裏表現了何等天才的洞察力，對於我們又是具有何等深刻的現實意義！

我們是否想到，要應用列寧的這些話去分析鐵托的空洞虛偽的「國際主義」詞藻呢？

是否應當把對於這一問題的實質了解作爲全黨的警號呢？

是否應當動員全體黨員，動員一切忠實於我國工人運動優良傳統的人們從事於堅決的鬥爭呢？

毫無疑問，曾經多次證明自己是忠實於工人階級，忠實於工人階級利益及其理想的我黨全體同志，一定會克服這種危險。

毫無疑問，哥穆爾卡同志在中央全會第二天的會議上所採取的自我批評態度，將在這方面予黨以幫助；因爲這種態度證明哥穆爾卡同志在中央全會尖銳而公開、誠懇的批評影響下，已了解到必須對

自己迄今所採取的根本錯誤立場進行重新審查。

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黨更加鞏固起來

在九國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後，哥穆爾卡同志底機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動搖性更其加強，但與之相反，黨中央委員會與黨則發展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保衛了波蘭工人黨底馬克思主義思想原則，鞏固了黨與工人階級的聯繫。

由於我黨採取此種正確路線的結果，使得黨的威信在人民大眾，首先是在工人階級中大大地增長了，這在職工會和工廠管理委員會的選舉過程中已經表現出來；在農民羣衆中，黨的威信亦大有增長，這在合作社機關的選舉中已經表現出來；此外，人民大眾對我黨信譽的增長，在我黨黨員數量的增長上也可以看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在檢討我黨建設中的右的民族主義傾向中，不同時對自我黨政治局開始直到我黨各級領導核心所存在的嚴重缺點與錯誤進行自我批評，那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原則。

必須指出，我黨領導機關對於哥穆爾卡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在其未形成傾向以前，未給以足夠有力的回擊。

89

我黨經驗充分證明了十個月以前情報局宣言中所述及的下列命題的正確性，即「目前工人階級底主要危險是對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與對帝國主義陣營力量的估計過高」。

黨中央委員會對於農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小商品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力量增長的對比沒有給

予分析，結果在黨的政策中便缺乏明確性。黨中央委員會對於在各級黨組織中不斷出現的關於上述三種成分可以和平而無鬭爭地共存共榮的機會主義思想，也沒有給予足夠的反擊。因此，黨的領導機關對於個別忽視鄉村中日益尖銳的階級鬭爭之現象，對於忽視鄉村中資本主義成分正在增長這一事實的現象便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其結果，必然會使黨的組織喪失革命前途，削弱其在某些環節中的階級鬭力，而產生出一種熄滅階級鬭爭的論調。

此外，黨中央委員會服從右傾機會主義傾向，隱匿鄉村階級矛盾的明確表現，就是對一切農民規定了統一的使用機器庫機器的價格，結果便曲解了機器庫保護缺地、缺工具的農民不受鄉村富豪剝削的本來意義。

像這種毫無階級區別的現象，在號召農民互相幫助的問題上也存在着。

最後，黨的領導機關對於向解放了的土地上移民的政策原則也是毫無批判態度的，結果使富裕的農民在移民運動中佔了優勢地位。

黨的領導機關，對哥穆爾卡同志底各種右傾民族主義錯誤，首先是對他企圖攔斷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之間的道路的傾向所持之容忍態度，及其因此而產生的對人民民主發展中階級鬭爭尖銳化事實的機會主義的隱蔽，曾給予了黨的實際工作和黨員的教育工作以極壞的影響。

在向黨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方面的工作作得太少、太不夠了。在人民波蘭存在以來的整個時期內，我們沒有作任何具體工作，來向黨介紹社會主義農村生活，使其了解集體農莊建設的真實情況，並武裝黨去回擊那些企圖曲解蘇維埃鄉村情況的反動派底隱蔽。

我們很少向黨介紹馬克思、列寧思想的成就，我們的出版工作在這方面太薄弱了。特別是在研究

聯共黨史，在研究聯共（布）黨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先進作用方面是很落後的。

由於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工作的薄弱，遂使黨對於黨員知識分子中間的思想混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對文學、藝術、科學問題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這在『鍛冶場』文學雜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就阻礙着我黨向文化戰綫的進軍，影響着我們高級學府的工作，可是在我們高級學府的工作中，特別是在人文科學方面，非馬克思主義的偽科學的偏見仍據有完全的統治地位。

對於機會主義與民族主義錯誤採取容忍態度，結果使我們在關於黨的作用問題上也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黨的領導機關沒有進行足夠有力的鬥爭以反對毫無批判地廣泛吸收黨員的傾向，這就說明我們對於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忽視。列寧的這一基本原則就是：黨乃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集合體，黨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由於在吸收黨員時忘記這些原則與缺乏警惕性的結果，遂使黨內混進了大量異己分子，以及假黨證為謀取其某種利益之工具的自私分子。

造成這些缺點的根源，就是對黨及黨的各級組織在進行波蘭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造中的領導作用認識不足。

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工作中存在一種壞作風；黨的領導機關不僅是脫離黨的積極分子，而且是脫離黨的中央委員的，各級黨的組織工作缺乏黨委制，對於選拔幹部的工作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對於職工會底銜接黨與工人階級的輪帶作用估計不足。

如果我們最大煩惱的問題，是幹部的經常奇缺的問題，那末幹部缺乏的根源，就正是上面所說存在於我黨生活中的各種壞現象，因為列寧主義的基本真理就是：『作爲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的

黨，乃是培養能於領導整個階級一切組織形式的工人階級領袖之最好學校」（斯大林語）。

大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不會對黨有害，而且相反，會從思想上鞏固黨，如果隱瞞或掩飾錯誤，那才是真正地削弱黨的力量。固執錯誤立場就會造成嚴重危險，如果不同這種嚴重危險作鬥爭，結果就會造成最嚴重的危機，造成不僅對黨而且對於國家的巨大而不可彌補的損失。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底反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這種嚴重危機的例證，它給予了南斯拉夫人民以不可彌補的損失，破壞了南斯拉夫與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思想與組織上的聯繫，而鞏固了帝國主義分子的侵略野心。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否認與其共同參加情報局組織之各黨，對其錯誤進行批評的權利，因此就脫離了國際組織的思想監督，而將自己置於該組織之外。黨中央七月全會曾分析了南共的情況，說明南共錯誤的性質，斥責了南共領導者在帝國主義侵略活動日益加強的條件下，分裂反帝的革命鬥爭統一戰綫之行爲。其後，南共領導者曾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其目的完全是爲着攻擊人民民主國家與蘇聯。而對一切出面反對南共領導者底此種危險政策的南國活動家們，則又以恐怖，鎮壓，暗殺的手段，迫使他們保持緘默。南共領導者們妄稱：南共是最好，最革命的政黨，它將較其他任何國家更快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它現在並沒有犯錯誤，而且過去也從未犯過錯誤，它不能容忍任何人的批評。像這樣的黨還有沒有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氣味呢？一點也沒有。它所有的，只是對參加情報局組織之各國共產黨的敵視態度，而不是與它們之間的思想上的一致。拒絕在國際思想組織範圍內進行列寧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其結果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拿我黨最近一次中央全會爲例來說吧，我們可以深信，對於錯誤進行公開、誠懇地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提高黨底思想力量的正確有效辦法。由於這種公開、誠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黨在

同我黨領導機關底思想動搖進行鬥爭中獲得了勝利。公開、誠懇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會幫助我黨領導機關大大提高了黨的政治、理論與思想水平，鞏固了並在經驗上豐富了黨的領導機關；而且毫無疑問，又以同脫離我黨基本路線的危險作鬥爭之偉大經驗豐富了全黨，提高了黨底戰鬥力與黨底警惕性，使黨的幹部都活躍起來，並大大加速了反對與已思想影響的鬥爭進程，加強了黨的團結與提高了黨的威信。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右傾傾向。爲達此目的，我們動員了全黨的力量。同樣，在我們反對那會給我們成就帶來致命威脅的右傾民族主義傾向同時，我們也不容許使錯誤的狹隘的左傾思想復活。

我們大家都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來愛護波蘭工人黨底寶貴的思想成就，愛護黨在反對侵略者鬥爭時期的光榮的優良傳統，愛護黨在建設人民波蘭之基礎的時期進行創造性工作的光榮、優良傳統，因爲在這中間，我黨成千成萬的黨員曾付出了血的代價，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勞動。

我黨是重視自己的領導者，重視他們對於全黨工作與鬥爭的貢獻，而且是信任他們的。但是黨之所以重視他們信任他們，僅僅因爲他們是黨與工人階級底指導思想之執行者。黨總是把對革命思想的忠實，對一切企圖鑽進黨內來的敵對影響之警惕性，擺在高於對個人的愛戴的。而這也就是我黨底力量所在，因爲它不是將自己的整個工作建築在領袖主義基礎上，而是把黨的積極分子與全黨羣衆底集體的努力提在第一位的。

我們同右傾、民族主義傾向進行鬥爭並不是容易的，因爲我們是在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與階級敵人瘋狂迫害的夾擊條件下進行的，而且這種階級敵人在自己的反共運動中總是採用着最煽動民心的、

最有毒藥的沙文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理論的武器。雖然有這樣許多困難，但我們深信，鬭爭的結果，將使黨較諸以往更鞏固更團結，在思想上更好的武裝起來，在反對機會主義影響的鬭爭中顯得更有鍛鍊，而在政治上也更成熟，使它能夠實現工人階級之統一，能夠完成建立統一的工人政黨之任務。

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波蘭而鬭爭

黨中央全會曾指出了工人階級、貧農、中農進行鬭爭的具體道路，以便限制資本主義成分對鄉村勞苦人民階級的剝削，給鄉村絕大多數人民以各方面的幫助，而剝奪富農在鄉村的優勢。

黨中央全會曾擬定了各種具體方策，以便在農村生活的各方面達到下列各項目的：此即保持穀物底足夠高的有利價格，實現正確的稅收政策，並在鄉村中實行有階級觀點的正確的信貸政策，擴大與改組機器站，以便使其首先服務於那些最需要幫助，亦即最缺乏工具的農戶；大量發展鄉村農民互助聯盟合作社，改進村合作社底工作並使其民主化，整頓與革新鄉村各級經濟、行政機構。

毫無疑問，實現黨中央全會的這些決議，就可以大大提高農民大眾的積極性，使他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地位，並在限制鄉村資本主義剝削的鬭爭中順利地對抗鄉村富農，提高自己的物質、文化水平。

黨中央全會更加發展了七月會議的決議，使黨在農村生產合作社問題上的立場更明確化了，對存在於農民大眾中間的，關於該問題的各项懷疑都給予了具體的回答。

黨中央全會明確指出，在農村中，由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的過程是長期的過程，根據黨的意

見，這是唯一能真正迅速發展農村福利，消滅鄉村貧困與資本主義剝削的方法，同時，又警告大家防止在這方面的一切急性病，指出在這方面的急性病就等於冒險。

黨中央全會極力強調組織生產合作社的絕對自願原則，並聲稱，一定要進行最尖銳的鬥爭，反對違反這一原則的一切可能的企圖。毫無疑問，黨中央全會對於發展農村生產合作社問題的說明是極明確的，而且將大大幫助我們撲滅階級敵人對該問題進行混淆黑白、播弄是非的一切企圖。

黨中央全會用了四天的工夫，對於依靠整個民主聯盟底行動統一而領導波蘭勞動大眾的我黨所經歷之道路，進行了總檢討。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的指導思想，就是人民波蘭的向新社會制度發展的思想。這種新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鞏固工人階級的國際聯繫

在勞苦大眾底粗野的日常生活中，蘊藏着人類的全部創造力，蘊藏着偉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先進的人類社會思想之偉大代表者們，都曾經從這種創造力的源泉中吸取了革命的鼓舞力量。那經過馬克思、列寧底天才智慧的創造，已經變為偉大的社會綱領，而現在又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偉大天才領袖與聯共（布）黨的領導者——斯大林大元帥所領導並加以豐富了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也正是從這種創造力的源泉中產生出來的。

我黨所領導的波蘭工人運動，在同專制帝王，同國內外法西斯主義，同希特勒的野蠻侵略進行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已經變得這樣成熟這樣有力量使它能够領導城鄉勞動大眾的廣泛的社會運動，這一

運動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各個民主政黨聯盟。在與佔領者進行英勇的決死戰鬥中，我國勞動人民曾獲得了蘇聯人民軍隊獻身的兄弟幫助。由於這種幫助，使曾遭希特勒侵略者破壞蹂躪的波蘭獲得了自由，而人民大眾則正在以不知疲倦的勞動建設着新的波蘭。這一建設底計劃，將由無產階級的偉大革命思想——馬列主義底忠實堅定的表達者，即各個工人政黨的共同努力，同時又依靠民主集團內各政黨底政治聯盟與幫助而製就。

利用了波蘭工運發展底八十年來的經驗，世界工運百年鬥爭的經驗，勝利的俄國革命底經驗，蘇聯三十年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根據着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黨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統一，波蘭工人階級底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政治統一正在完成着。

統一的工人政黨將負起其對於波蘭人民未來命運的歷史責任，並保證其未來的繁榮。它將鞏固地團結民主集團底力量，保證波蘭獲得其在世界進步民族中所能够佔有的政治、文化地位。依靠於工、農、知識分子聯盟（其政治代表就是民主集團），它能够，也只有它才能够保證波蘭勞動人民底日益增長的幸福生活。

但是，我們一分鐘也不應滿足於既得的成績，因為我們迄今所達到的成就，只是實現波蘭人民所面臨的偉大任務及其偉大目標之開端。

作為未來的統一政黨之主力的我黨，現在既能領導着波蘭勞動羣衆在馬列主義底旗幟下勇敢前進，它也定能很好地、勝利地完成其歷史任務。

（伊真譯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斯卡特謝科夫

——少共真理報「答讀者問」——

維列索夫同志（唐波夫省）問：我們應當怎樣理解：蘇聯人民與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族人民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的發展上展開了一個新時期，一個勞動人民由剝削者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的時期。政權之轉入工農手中，乃是社會發展中最偉大的質的飛躍，這一飛躍給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帶來了深刻變化。

在革命後起了根本變化的各民族精神生活的本質的表現之一，就是勞動羣衆對於自己的祖國的態度。

在沙皇俄國，人民對祖國土地、祖國文化及其傳統的喜愛，曾是與對壓迫者、對剝削者在國內所建立的野蠻秩序的強烈仇視結合着的。地主與資本家們，卑鄙地利用工農的愛國感情，曾力圖以民族主義來毒化羣衆，而在所謂「民族統一」的利益下宣傳調和階級矛盾的說教。俄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就曾經進行了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他們了解：民族主義會給民衆的解放運動帶來如何巨大的毒害。然而和這個毒藥東西進行真正廣泛的具有原則性的鬥爭，則只是從無產階級——它本身就是天生的國際主義的階級——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才展開的。在無產階級出現以前，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過真正的國際主義。以前，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沒有越出民族主義的範圍，而壓迫階級的國際關係，則從來與國際主義未曾有過任何共同之點，因為他們的基本思想，就曾經是而且現在也是掠奪和奴役別的國家與別的民族，而不是各民族平權互助的思想。舊世界只知道一個『結合』各民族的手段——侵略，當然，這是任何時候也不能把他們結合起來的，它只能引起民族解放運動，並使這種由於內部矛盾而分崩離析的、成份複雜的『結合』趨於瓦解。

無產階級對於愛國主義有自己完全新的理解。列寧曾把愛國主義特別縝密而完整地歸納在他的論文『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裏。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愛自己的祖國，神聖地尊崇着祖國的革命傳統，奮不顧身地進行着從剝削者手中解放祖國的鬥爭。列寧教導說：『大俄羅斯人（以及一切民族）無產者的社會主義利己（不是奴僕心目中的那種自傲精神）利益與大俄羅斯人（以及其他一切民族）無產者的社會主義利益相合。』（列寧全集，第十八卷，八三頁）這種對於愛國主義的革命的、引導羣衆首先去和『自己的』壓迫者鬥爭，去和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勞動人民團結。愛國主義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並成爲真正徹底的革命的愛國主義。

資產階級拚命宣傳——而國際主義在這點上又幫助了它——自己的由民族壓迫中求得民族『解放』的方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加強不同民族的勞動人民之間的民族仇視。這種方法，其結果就是加強各國資產階級的陣地和使勞動人民更加受到苛重的奴役，削弱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吸使這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壓迫少數民族，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政策。

十月革命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方法，以建立不同民族工農的兄弟聯盟手段，解放了各被壓迫民族，而奠定了勞動人民對於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之新態度的基礎。我們祖國的一切民族的勞動人民，

都以熱愛注視着蘇維埃國家，注視着它的領導民族——俄羅斯人民；他們的民族利益，是和所有蘇聯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和建設共產主義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會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够從地主資產階級統治者所造成的軍事破滅，經濟破滅中挽救了我國。會只有革命，才能够避免了我們祖國失去民族獨立而為外國帝國主義所完全征服。遭到兩次戰爭破壞的國家的經濟復興任務，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府所無能為力的。然而，資產階級無能為力的事情，當政權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時候，却可以付諸實現。斯大林同志說：蘇聯生產之空前增長，不可認為這是國家由落後走向進步的簡單、普通的發展。這是飛躍，是完全藉助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藉助於國家工業化與農村集體化的蘇維埃政策才實現的飛躍。正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才能够使得在最短期間內建立了這樣的物質財源，我國人民依靠這個財源，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維護了自己的民族獨立，並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了許多歐洲民族。因此，蘇聯勞動人民認為我國的政策就是自己的政策，我國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的勝利，就是人民共同的勝利。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乃是勞動人民由於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感到的自尊心。

資本主義把文化引向了破產和頹廢，而人類由於歷史發展進程早就面臨這樣的選擇了：「或是犧牲一切文化，或是以革命手段用脫資本主義的枷鎖，剷除資產階級的統治，爭取社會主義社會與持久的和平。」（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一四五頁）只有蘇維埃政權才給予了過去曾被壓迫的和會走向衰亡的民族以發展自己文化的可能，像一個獨立民族那樣復興和發展的可能。

被解放了的各民族，自願地結合在一個親如兄弟的大家庭裏。世界認識了一種在平權、友愛、任務與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各民族真正團結的新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陳舊的令人作嘔的民族主義，就是

人們意識中最危險的資本主義殘餘，因為民族主義將離開各民族，削弱他們之間的友誼，因此它與勞動羣衆真正的愛國主義是不能相容的。

布爾塞維克黨考慮到「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在民族問題方面，遠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富有生命力」（斯大林），經常對民族主義進行了無情的鬥爭。在我國，民族主義的表現，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蘇維埃政權、布爾塞維克黨以貫穿國際主義精神的新愛國主義，教育了我國人民，斯大林同志說：「蘇維埃愛國主義，不是分裂，相反，而是團結我國的所有民族成爲一個統一的兄弟家庭……」。同時，蘇聯各族人民尊重外國各族人民的權利與獨立……。「蘇維埃愛國主義，在所有加入蘇維埃聯邦的各民族的友愛上，在這一個共和國對另一個共和國的兄弟之誼的幫助上，在民族文化的繁榮上，都得到了鮮明的表現。

新型的愛國主義，在勞動人民取得政權的人民民主國家中產生着和鞏固着。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各民族，打碎了剝削者的枷鎖，建立了人民的國家，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團結在各國共產黨的周圍，他們看到並覺悟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就是他們民族利益的最高表現。執行國家的國民經濟計劃，熱情的勞動，民族文化的急激發展——所有這些都是人民民主國家勞動人民的新愛國主義的表現，這種愛國主義是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結合着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民族曾經進行的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民族現在尚在進行着的反對帝國主義陣營及其走狗的鬥爭，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使這些國家的民衆明確地認識到：只有各民族的緊密協助才能贏得勝利，蘇聯的強有力的支援與幫助，乃是贏得勝利的決定因素。由此而來的，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各民族互相之間、與蘇聯之間的密切友誼。由此而來的，是這些國家勞動人民對於蘇聯，

對於這一在生活中澈底、完全體現了社會主義原則的國家的熱愛。

與任何民族仇視的表現都相去甚遠的國際主義——它是新愛國主義不可毀棄的構成部份——使勞動人民的敵人大為激怒。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在著名的「汎歐羅巴」奴才計劃的統一中，正在復活着陳舊的民族主義的夢幻。他們想以民族主義代替愛國主義，想以世界主義代替國際主義。他們——民族主義者，對於他們來說，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就高於一切！他們——世界主義者，他們的宣傳家宣佈說：打倒民族主義！爲了美國憲兵與公司推銷員的行動自由，取消一切國界！

勞動人民知道：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牌子的兩面，賤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者，與爲了取悅於美帝國主義者而賤視自己民族的世界主義者，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之處。

社會民主黨卑劣的民族主義的實踐，恰好是法西斯的毒惡宣傳得以成長的地基。列寧還在一九一五年就曾寫道：「機會主義與社會民族主義，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血肉關係，聯繫，以及相同，是毫無疑問的。」這些指責的話，正打中着今天的右派社會黨人，妄圖阻擋各民族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運動的法西斯主義復興者。

無論是蘇維埃愛國主義，或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愛國主義，沒有國際主義，都是不可想像的。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各民族的愛國主義，是取得政權羣衆的在歷史上尙未見過的新愛國主義。因此，帝國主義者是如此仇視它與懼怕它，因此，他們力圖以一切手段在各民族之間撒佈不信任，力圖以民族主義的毒藥來毒害各民族，力圖分裂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

（仲平譯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少共真理報）



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1949. 4. 初版 長. 1—10,000.

基本定價： 240 元

155